

坦桑尼亚参与全球化的得失

李保平

内容提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坦桑尼亚先后实行以经济体制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为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型，否定了以往的社会主义政策取向，2000 年，《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坦桑不再具有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坦桑从而重新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坦桑执政党掌握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导权，获得了执政的政治合法性，并得到了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国际援助，扭转了经济颓势；同时付出了国家主权受到严重侵蚀、政治团结和统一受到严重损害、社会公平受到影响等沉重代价。

关键词 坦桑尼亚 全球化 结构调整 民主化 得失

作者简介 李保平，1958 年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秘书长。

在 2001 年初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坦桑尼亚（以下简称“坦桑”）总统姆卡帕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政界和商界领袖，发表了对全球化的看法。他指出，倘若游戏规则可行、公正和人道，坦桑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可以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所作为并得到益处的。他批评发达国家“侈谈全球化带来繁荣，却缺少政治意志和真诚，未能帮助非洲摆脱贫困”；指出增加对非洲的投资、减免非洲债务，改善贸易条件应与全球化相伴而行，呼吁发达国家拿出诚意，提供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在建设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在控制艾滋病和疟疾、肺结核等疾病以及其他方面给予非洲更多的帮助。他还指出，“只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和跨国公司帮助最不发达的国家增强能力和竞争基础，全球化才有可能惠及穷国。”¹ 这番话语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坦桑对参与全球化的态度。坦桑积极倡导和推进区域合作、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在国际讲坛上大声疾呼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全球化国际秩序和运行规则。在防治艾滋病、打击国际恐怖活动、环境保护等问题上，坦桑积极利用国际社会治理全球性问题的各项措施，谋求国际合作，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许和帮助。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强，政治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西方挟经济、政治、军事的强势，欲将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压力之下，弱小的非洲国家难以单一抵挡。对于包括坦桑在内的大部分非洲国家而言，问题已不是搞不搞市场化和民主化，而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怎样审时度势，趋利避害。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对非洲的影响，集中表现在国际金融组织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和多党民主化问题上。在这些问题上，坦桑的对策有自己的特色，也有颇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

¹ “How Can Globalization Deliver the Goods: The View from the South”, <http://www.weforum.org/site/homepublic.nsf/Content/Homepage>; “Tanzania Urges Rich North to Help Africa Overcome Poverty”,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200101/27>.

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

1986 年和 1992 年是坦桑历史上两个重要的年份, 坦桑先后开始了以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政治民主化为内容与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型。

经济和政治转轨过程艰难而曲折。坦桑长期以来以社会主义为政策取向, 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 自 1967 年起实行对私营银行、工商企业的国有化, 并在农村开展“乌贾马社会主义”运动, 动员分散的农户迁移, 集中居住和耕作。这些措施反映了坦桑人民维护国家独立、加强民族团结和发展民族经济文化的要求, 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通过国有化, 坦桑尼亚已建立一批具有相当生产能力的国营企业和准国营企业。伴随“乌贾马社会主义”运动, 向公民提供社会福利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展, 如普及中小学教育、开展成人扫盲教育成绩显著, 农村清洁水供应设施、医疗卫生设施也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此外, 坦桑为追求社会公平做了很大的努力, 比如采取了限制各级行政官员物质特权的措施, 缩小了个人收入间的差别。但消极的影响也很明显。乌贾马运动中部分地区强制农民迁移、集中并没有激发起农民的劳动热情。国有化造成大量外资抽逃和经营人才流失, 国营企业及国营农场因缺乏资金、管理不善而使生产率下降, 陷入困境。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石油市场油价上涨, 资本主义世界的持续滞胀、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东非共同体解体 and 连年的自然灾害, 使坦桑经济雪上加霜。70 年代后期以来, 坦桑经济开始下滑, 工农业生产持续下降, 对外贸易赤字激增, 外汇储备告罄, 市场商品匮乏, 货币贬值, 物价飞涨, 财政入不敷出, 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 坦桑推出了一系列振兴经济的举措, 如增加农业投资, 取消乌贾马村庄的集体耕地, 允许农民返回原有土地, 鼓励发展小农经济, 鼓励兴办私营农场, 改造农业合作社体制; 大力整顿国营企业; 注意发挥私人工商业的作用; 放宽进出口管制, 鼓励私人经营国内外贸易。这些举措使经济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仍有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如通货膨胀没能得到有效抑制, 债务增多, 财政赤字居高不下, 外汇储备枯竭引起能源危机。为缓解外汇短缺、刺激经济振兴, 寻求外援、获得资金支持成为当务之急。然而, 国际金融组织的援助是以接受其结构调整方案为前提的, 这一前提受到尼雷尔总统的强烈抵制。他指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成为殖民帝国的化身”, 是“一个经济帝国控制别国经济的工具。”¹ 在尼雷尔总统任职期间, 坦桑一直拒绝以放弃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为条件接受国际贷款和外援, 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权以国际“金融警察”的身份行事。^④

1985 年 11 月 5 日, 姆维尼接任坦桑总统, 随即恢复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对话。翌年 10 月, 坦桑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 接受了对方拟订的结构调整和财政金融稳定的措施, 因此得到西方的援款和重新安排债务的允诺, 缓解了外汇紧张的难题, 为恢复经济增添了推动力。这样, 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与国际金融组织的艰难谈判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坦桑成为最后接受方案的非洲国家。

姆维尼政府和后任姆卡帕政府均执行经济结构调整、改革的政策, 在宏观经济政策上,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 压缩政府财政开支, 控制货币发行量, 强化税收, 采取贸易自由化措施, 以扩大生产, 增加外汇收入, 平衡国际收支与财政预算, 平抑通货膨胀; 颁布鼓励外国投资、私人投资的法律法规, 建立自由港、出口加工区和经济开发区, 兴建基础设施, 为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创造条件; 加强银行的作用, 进一步放松外汇管制, 允许私人开设外汇兑换所, 减少对外贸的控制, 鼓励出口; 推行私有化, 着手对 400 多家国营企业进行改革, 采取合资、售股、租赁和承包等管理方式, 减少国营企业的数量, 减少国家对亏损企业的补贴, 对无法赢利的企业进行清理和关闭。同时推出减税、小额信贷等措施, 扶植本国中小企业的发展。通过上述调整措施, 经济出现缓升趋势。

¹ “Julius Nyerere Speaks”, *New African*, January 1985, No. 208, p. 15.

^④ Goran Hyden, “Top-Down Democratization in Tanzania”, *Journal of Democracy*, October 1999, vol. 10, No. 4, p. 144.

经济体制转型后的坦桑事实上已放弃社会主义的政策取向。坦桑政府领导人或政府文件都强调私有经济的作用：“私有经济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我们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私有化”，“创造一个私人经济活动的有利环境，增强私有经济部门的作用。”¹ 2000年2月，坦桑国民议会通过的第13次《宪法修正案》，重新对“社会主义”的含义进行界定，明确提出坦桑不再具有社会主义国家性质。

政治民主化进程

1965年起，坦桑摒弃了建国初期仿效英国建立的多党民主制，规定实行一党制，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以下简称“坦盟”）成为大陆惟一合法政党。1977年，坦盟与坦桑岛屿部分的执政党非洲—设拉子党合并为坦桑革命党，当年通过的新宪法申明它是坦桑惟一合法政党。

在新独立的国家中，政治权力的相对集中，对于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增强国家的凝聚力，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从事国家建设，对于培养统一民族的共同民族意识，进行民族构建和民族整合，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是十分必要的。坦桑实行一党制的近30年间，政府采取协商一致的决策程序，注重营造社会和谐气氛，增强民族团结，执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政局长期保持稳定，民主一体化发展进程比较顺利。

另一方面，在一党制下，国家发展战略出现较大的偏差，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坦桑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列。在缺少竞争和监督机制的环境下，执政党的活力逐渐受到削弱，官僚主义、贪污受贿、假公济私等现象猖獗于执政党、政府机关，并蔓延到整个社会。国际环境也不利于坦桑继续实行一党制。

尽管最初尼雷尔和坦桑执政党反对实行多党民主制，认为它不符合国情，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尼雷尔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尼雷尔严厉谴责西方企图把多党制强加给非洲和施以经济援助相威胁的做法；另一方面，他意识到一党制的弊端，并号召执政党加以剔除。他指出，“如果革命党人认为多党制不适合自己的国情，就应该纠正自己的弊端，并使人民对它领导国家发展经济的能力信服。”“多党制将不可避免。”20世纪90年代初，尼雷尔表示，坦桑实行多党制的时机已经成熟。^④

1990年，作为执政党主席的尼雷尔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各界就是否在坦桑实行多党制问题发表意见。1991年2月，姆维尼总统宣布成立总统委员会，负责调查对未来国家政治体制的意见。同时派团出国考察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家的政治体制运行情况。同年11月，总统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揭晓，主张继续实行一党制者，大陆占大多数，桑给巴尔明显占少数；余者主张实行多党制。^⑤ 尽管如此，总统委员会认为，在当前条件下，实行多党制对国家有利。1992年2月，坦桑革命党召开全国特别代表大会，接受了总统委员会的政策建议，通过了实行多党制的决议，并完成了党章和宪法的修改工作。1992年5月坦桑国民议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提出坦桑是多党民主国家，坦桑开始向多党制过渡。

1995年10月坦桑举行多党民主选举，全国有13个政党参加，有4名候选人参加角逐。结果，执政党候选人、原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本杰明·姆卡帕以61.8%的得票率当选为坦桑总统；在桑给巴尔，执政党推选的候选人萨勒明以微弱优势连任桑给巴尔总统。在同时进行的全国议会选举中，坦桑革命党获得232个议席中的186席，占80.2%。^⑥ 在政治体制转轨中，革命党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保证了民主化运动和平有序地进行。5年后，2000年10月，坦桑举行第二次竞争性大

¹ <http://www.tanzania.go.tz/administration.html>.

^④ A. N. Kweka, “One-Party Democracy and the Multi-Party State”, C. Legum and G. Mmari (eds.), *Mwalimu: the Influence of Nyerere*, Britain-Tanzania Society, 1995, p. 75.

^⑤ Ibid., pp. 76-77.

^⑥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 1998, p. 1037.

选, 执政党在竞选时以邻国混乱的政局为例, 强调选民应投票赞同强有力的党而不是分散的在野党才有利于国家稳定。这一竞选策略奏效, 姆卡帕再次当选总统, 得票率为 71.1%。在同期的议会选举中, 执政党又以较大优势胜出。革命党候选人卡鲁梅当选桑给巴尔总统。¹

必须指出, 尽管与许多非洲国家相比, 坦桑执政党是主动地实行变革, 把握着民主化进程的主导权, 但执政党受形势逼迫而作出无奈选择的成分仍是相当大的。冷战结束后的非洲面临西方世界的巨大压力, 非洲国家莫不如此。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将人权、政治多元化等作为向坦桑恢复提供经济援助的前提条件, 原先曾对坦桑提供援助的北欧国家甚至公开支持坦桑反对派造势。而坦桑经济发展所需资金的 80% 源于西方。为了继续获得经济发展必需的援助, 坦桑政府只能面对现实, 像当年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改革方案那样, 按照西方援助国的要求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参与全球化的利弊

在进行经济调整的过程中, 坦桑从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获得了资金支持的便利, 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后者。坦桑注意加强与西方捐助国、债权国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 以谋求吸引外资、减免外债、获得更多的贷款和援助。坦桑宏观调控的成果受到国际金融机构和债权国的肯定, 坦桑的外债因此多次被重新安排或减免, 西方的贷款和无偿援助得以持续。1999 年, 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基于各种经济指标, 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率、公共支出等指标, 指出坦桑是非洲宏观经济绩效最好的国家。^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于 2001 年底确认坦桑达到了高负债贫困国优先权的标准, 承诺在未来 20 年内减免坦桑外债 30 亿美元。坦桑因此成为继玻利维亚、莫桑比克和乌干达之后第四个享受这一优惠的国家。^⑤

在政治转型过程中, 坦桑执政党认真总结了许多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使政治体制改革有计划、有控制地稳步推进。执政党控制了实行多党制的时间、步骤和方式, 将诸多政党的活动限制在法律框架内, 使坦桑在多党民主的条件下仍能维持政局的基本稳定, 成功地经受了反对党的竞争和挑战。坦桑的变革没有出现类似苏联东欧和非洲其他地区的政治震荡, 这是非常难得的。姆卡帕总统执政以来, 厉行法治, 严惩腐败, 减少政府机关冗员, 提高工作效率, 在政治发展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虽然政治改革的进程相对缓慢, 有的学者称之为“爬行的民主化”(英文为“creeping democratization”)^⅔, 但很多观察者承认, 在保障公民政治自由、放宽新闻管制等方面坦桑有长足的进步, 违反自由和民主价值行为的频度和程度都比以前大大降低。^⅕

在控制腐败问题上, 实施经济调整方案后的国际监督和制约也有较积极的影响。例如, 1994 年, 一些政府官员接受富商贿赂而允许其逃税, 造成坦桑税收和经济秩序混乱, 引起西方捐助国不满。它们联手中止援助坦桑, 迫使坦桑政府采取措施。坦桑政府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国家税收管理局统管全国的税收, 补征税款并制裁涉案官员, 平息了西方的不满, 援助因而陆续得到恢复。^⅔

通过体制转型, 坦桑执政党赢得了政治合法性, 也赢得了国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援助资金。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扭转了经济连年下滑的局面, 国民经济走上复兴的轨道。近年来国内生产总值

¹ “Tanzania: General Elections 2000”, <http://www.humanrights.uio.no/forskning/publ/wp/wp200109.html>.

^④ Goran Hyden, op. cit., p. 142.

^⑤ “IMF and World Bank Support US\$ 3 Billion in Debt Service Relief for Tanzania under Enhanced HIPC Initiative”,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01/pr0148.htm>.

^⅔ Goran Hyden, op. cit., p. 143.

^⅕ Ibid., p. 152.

^⅔ Shahr-zad sedigh & Alex maganda,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Tick Staphenurst & Sahr. J. Kpundeh (eds.), *Curbing Corruption: Toward a Model for Building National Integrity*, World Bank, Washington D. C., 1999, p. 152.

增长率保持在 4%~5% 的增速。出口多样化取得进展,黄金、钻石等贵重矿物的勘探、开采和出口成绩斐然,为赚取外汇做出了重要贡献。坦桑成为非洲继南非和加纳之后的第三大黄金生产国。¹

尽管加入全球化进程、重新纳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坦桑获得明显的利益,然而,全球化进程带给坦桑的不仅是成功和喜悦。像许多非洲国家一样,随着结构调整方案的实施和政治民主化的推行,坦桑放弃了原先的社会主义取向,国家经济主权受到严重侵蚀。事实上,西方推行的发展模式成为无可替代的选择,坦桑在经济政策选择和发展战略的制定上已丧失了部分行动自由。^④ 作为一个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在参与全球化问题上比其他非洲国家表现出更多的自主性,坦桑注定要体验全球化的苦涩。以下着重从国家统一和社会发展两个方面分析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带来的消极影响。

(一) 民族一体化进程发生局部逆转,国家团结与统一面临严峻挑战

尼雷尔曾尖锐地指出,“多党制最大的弊病是容易导致国家的分裂,对年轻国家尤其是这样。”^④ 伴随多党民主制而来的是中央权威的弱化,它对一个建国历史不长的发展中国家的消蚀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尼雷尔所担心的情况已在坦桑显露端倪,为此,执政党耗费了颇多精力。

实行多党制以前,坦桑是非洲成功地处理民族关系、在多民族国家中成功地实施民族一体化进程方面堪称楷模的国家。同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坦桑独立时尚未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全国共有 120 多个族体。坦桑独立以来,在尼雷尔的领导下,坦桑采取了符合国情、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努力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加强民族团结。坦桑从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大局出发,重视对后进民族的帮助;在宗教问题上,贯彻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各教平等、政教互不干涉等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方针政策,^{1/4} 从而使基督教教徒与穆斯林友好相处;在大陆与桑给巴尔关系问题上,桑给巴尔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利,尽管在桑给巴尔一直存在着某种离心倾向,但尼雷尔的正确领导、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和审慎、宽容的举措,使各种矛盾及时化解,分离主义者的活动并未对国家前途构成威胁,大陆同桑给巴尔的团结和联合不断得到巩固与加强。坦桑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独立 30 多年来,社会安定,政局平稳,国家统一和民族一体化得到顺利发展。

然而实行多党民主制以后,一些不负责任的政客利用政治多元化带来的政治空间,以民族自决、宗教自由等幌子煽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从事分离主义活动,使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受到严重侵害。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桑给巴尔岛、奔巴岛^{1/2} 为基地的反对派人士公开打出了分离主义旗号,加紧进行反对联合体制的活动。在此背景下,1992 年 12 月,桑给巴尔政府擅自加入伊斯兰会议组织,遭到联合政府的强烈反对,尽管迫于联合政府的压力桑给巴尔退出伊斯兰会议组织,但合分之争并未平息,联合问题表面化。1995 年选举时,执政党推选的候选人仅以高出对手 0.4% 的得票率胜出,当选为桑给巴尔地方政府总统,反对党公民联合阵线称执政党有舞弊行为,拒绝承认选举结果。^{1/4} 5 年后的总统大选,桑给巴尔再度出现政治危机。反对党指责选举委员会受执政的革命党操纵而蓄意破坏选举,拒不承认执政党候选人获胜,多次组织反政府的示威游行,要求在全部选区重新投票,并要求修改 1964 年制定的宪法中关于桑给巴尔岛与坦噶尼喀合并的部分内容。桑给巴尔的政局动荡持续数月,引发流血冲突,2001 年 1 月动乱高峰期间,至少 23 人在冲突中丧生,200 余人受伤,

¹ Goran Hyden, op. cit., p. 142.

^④ 参见钟伟云:《全球化与非洲的边缘化》,载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编:《非洲:变革与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4 页。

^④ 《尼雷尔谈坦桑尼亚革命党和阿鲁沙宣言》,载《国际共运资料》,1987 年第 10 期。

^{1/4} 参见葛公尚:《初析坦桑尼亚的民族过程一体化》,载《民族研究》,1991 年第 2 期,第 45~51 页。

^{1/2} 桑给巴尔政府的管辖区域主要为桑给巴尔岛和奔巴岛。

^{1/4}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 1998, p. 1037.

不少反对党核心成员被拘禁。¹ 奔巴岛已成为反对派分裂势力的基地, 执政党的政令在该地已难以下达和贯彻。大陆与桑给巴尔的矛盾成为影响坦桑团结和稳定的重大隐患。

还值得注意的是, 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近年来相当活跃, 他们无论在桑给巴尔还是在大陆都有活动基地, 经常散发一些煽动宗教仇恨的宣传品, 并与境外的宗教极端势力来往, 不时制造事端。另外, 公共开支的减少和财政调拨的困难, 使以往政府对落后民族的扶助政策难以为继, 令落后民族失望, 也不利于统一民族的构建。

在发展中国家, 无论是进行民族一体化建设, 还是进行经济建设, 一个能凝聚全国人民的意志, 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的强有力的中央领导和一个使人们能够同心同德、专心致志地从事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稳定政局是非常必要的。然而, 坦桑实行多党民主化后出现党争, 联合政府的权威和施政能力受到削弱, 导致政治危机, 这给统一民族的构建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相当大的消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 坦桑民族一体化进程已发生局部逆转, 国家的团结和统一面临严峻挑战。

(二) 经济虽有增长, 社会却无发展

从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速度等指标看, 坦桑经济形势有所好转, 经济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开始显露一些积极的效应。而另一方面, 调整和改制的代价也是很大的。货币贬值和贸易自由化等措施引起进口产品、进口原料, 尤其是石油价格的上升; 财政紧缩造成投资下降, 企业开工率不足, 国有企业效率低下, 造成经济增长, 尤其是工业增长的速度相当缓慢。

更突出的是, 人民生活水平未因政治经济改革而得到明显改善,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在全国超过 40%, 近 60% 的人日均收入不足 2 美元, 近 20% 的人平均在 1 美元以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2001 年仅为 264 美元, 尚不及 1980 年 (280 美元)。学龄青少年入学率持续下降。公共机构和社会服务行业的服务质量没有改善, 坦桑以往引以自豪的良好社会治安状况呈现恶化趋势。失业率居高不下, 大批无业游民沦落街头, 加重了维持社会治安的压力。全国医疗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 婴儿死亡率达 14.9%, 人均预期寿命仅为 44 岁 (1980 年和 1990 年分别为 52 岁和 56 岁)。^④ 艾滋病呈蔓延趋势, 感染率为 8.8%, 为此, 坦桑每年失去大量年轻劳动力, 2001 年约有 14 万人死于艾滋病。^⑤ 有媒体报道, 有些人认为宁肯死于艾滋病也胜过死于贫穷; 而一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则宣称自己更乐意传播疾病, “让大家一道去死”^{1/4}。可见, 贫穷和艾滋病都会导致某种社会恶果和心理病态——不平、绝望、对社会的报复。各种社会问题的恶化既危害社会安定, 也为反对党煽动和加剧不满情绪提供了口实。

不容否认的是, 出现社会发展方面的问题显然是与政治经济体制转轨密切相关的。物价放开使国内消费品价格和服务价格猛涨, 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更重要的是, 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以及政治的多元化等, 削弱了政府管理的效能和社会调控能力, 用于社会福利、医疗保健、教育等方面的政府公共支出被大幅度削减, 由此引起社会福利和教育卫生条件的恶化。从某种意义上说, 坦桑处于经济有增长, 社会无发展的境况中。经济政治转型后的坦桑与尼雷尔时期形成看似奇特的比照: 尼雷尔总统任职时期经济虽然没有显著增长, 社会发展却颇有成效, 包括清洁饮用水的提供, 医疗条件的改善, 中小学教育的发展, 成人文盲率的降低等方面的成就, 曾为许多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所称道。

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 不仅包括经济增长, 也包括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从长远的眼光来看, 经济和社会能否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 能否使人民群众因改革而得到实惠, 是决定执政党能否继续保持和巩固执政地位的关键, 也是检测坦桑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可取的重要标准。

(责任编辑: 徐 拓 责任校对: 吴传华)

¹ “Tanzania: Background”, <http://www.norad.no/default.asp>.

^④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World Ban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35–239.

^⑤ UNAIDS, *Report on the Global HIV/AIDS Epidemic 2002*, July 2002, p. 190.

^{1/4} Goran Hyden, *op. cit.*, p. 153.

globalization, the further ameliora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nvironments will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anti-poverty actions of the African countries.

Gains and Losses of Tanzani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ization

Li Baoping

pp. 29– 34

Since the 1980's, Tanzania has been carrying ou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characteristic of the liberalization, market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of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which has denied Tanzania's previous socialist policy tendencies. The 2000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makes it clear that Tanzania is no more a socialist country, thus bringing it into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and

gain. The ruling party of Tanzania has controlled the leading power to implement political reforms, acquired the political legitimacy of being in power, obtained the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for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versed the declining tendency of its economy. However, it has also paid a high price of the severe erosion of the Tanzanian sovereignty and impairment to political unity, unific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Nigeria in the Dilemma of Globalization

Zheng Xian

pp. 35– 40

Nigeria, as well as other 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can not resist globalization. The apparent long dependence of imports and exports trade of its economy means Nigeria's development won't do without globalization. However, globalization mainly favors the unidirectional flow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operation under such unilateral globalization is more favorable to the investor. As far as Nigeria is concerned, its inferior economic and tech-

nological status means globalization will exert a negative impact on Nigeria. What's more, high centralization of the state power during the military regime, the prevalence of corruption, the governmental interference in the accuracy of economic information and the frequent internal social disturbance since the return to the civilian rule constitute the main obstacles to Nigeria's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ization.

A Concise Analysis of the Asad Political System

Wang Xi

pp. 55– 60

The era of Asad (1970– 2000) is an important period in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Syria, during which, depending on the army, the Bath party and the state bureaucracy, and through the state's firm control over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 Asad set up an authoritarian-presidential system of one-party characteristic of patriarchal monarchy. Depending on the system, Asad transformed Syria from a small and weak state into a regional power, which has been keeping a long-time polit-

ical stability. As the particular outcome of Syrian social-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system of Asad is characteristic of complexity, transitivity and being an intermixture. On the one hand, the system basically meets the objective needs of the Syria's social development; hence, it has considerable rationality and legitimacy. On the other hand, the system also has its limitations and disadvantages, which put a heavy burden on Syria's future political development.